

从“种族叙事”到“大西洋转向”： 海地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马伟军

【提要】 海地革命改变了大西洋世界,也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际学界关于海地革命的研究经历了从“种族叙事”到“阶级叙事”,再到“大西洋转向”的转变。“种族叙事”强调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精英的革命领导作用,忽视广大奴隶的作用,认为没有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不可能取得革命成功。“阶级叙事”突出阶级冲突,认为革命是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该叙事经历了从强调黑人雅各宾派作用到广大奴隶作用的转变。“大西洋转向”则重视革命起源、发展和影响的“大西洋因素”,认为海地革命与美国革命及法国革命一样,深刻影响了大西洋世界。在此情况下,海地革命研究成为大西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转变是时代政治演变和法国革命史学,乃至西方史学发展的结果,革新了海地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海地革命 圣多明各 法国革命 大西洋史

美国历史学家马利克·W. 加赫姆(Malick W. Ghachem)认为,海地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在18世纪最后25年改变大西洋世界的三次民主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中,它最不为人所理解。^①这显然与大西洋革命时代海地革命的重要性不相符。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起义,海地革命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美洲第二个“共和国”,震撼了大西洋世界。然而,由于法国公共话语中对种族概念的排斥,以及海地革命在法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法国革命史家长期忽略了海地革命,殖民地在革命史研究中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②随着全球史、跨国史和大西洋史的兴起及法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原本属于法国殖民史研究范畴的法属加勒比殖民地和海地革命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特别是近二十年,海地革命研究已成为独立的研

^① Malick W. Ghachem, *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 – 1804: An Exhibition at 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2004.

^② 在法国革命史学中,除了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大部分历史学家,从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到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均忽视了殖民地问题。甚至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和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在阐述大西洋革命时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参见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The Specter of Saint-Domingue: American and French Reactions to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18; Manuel Covo, “Race, Slavery, and Colon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90; Yves Béno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in des colonies*, la Découverte, 1988, p. 10; David Geggus, “Thirty Years of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iography”, *Revista Mexicana del Caribe*, Vol. 3, No. 5, 1998, p. 188; Francis Arzalier, “La Révolution haïtien dans l’imaginaire français”, dans Michel Hector, di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Haïti: Filiations, Ruptures, Nouvelles dimensions*, Tome 2, Henri Deschamps, 1995, pp. 348 – 357; Claude Wanquet, *La France et la première abolition de l’esclavage: 1794 – 1802: Le cas des colonies orientales Ile de France (Maurice) et La Réunion*, Karthala, 1998, p. 9.

究领域,并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史学乃至大西洋革命史研究。这是欧美学界对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及海地革命史研究内在发展的结果,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回应。

国际学界对海地革命史的研究已不胜枚举,海地历史学家米歇尔·埃克托尔(Michel Hector)、英国历史学家戴维·P. 格古斯(David P. Geggus)和美国历史学家杰里米·D. 波普金(Jeremy D. Popkin)对海地革命研究的学术史做过简要梳理。1993年,米歇尔·埃克托尔阐述了1946年后海地社会运动和知识变化对圣多明各革命史学演变的影响,并以1946年为分水岭,把海地关于圣多明各革命的史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革命史学不仅突出自由有色人种和杰出黑人领袖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强调从初期的奴隶起义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连续性,以论证海地革命的合理性,表达黑人种族对自由的天然追求和再生愿望;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史学对早期的研究倾向有所继承,但越来越强调与殖民结构和解放斗争有关的社会方面的联系,日益重视下层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行为和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参与革命斗争的情况,涉及的主题多样化。^① 1998年,戴维·P. 格古斯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地革命史学,但并未分析当时政治和学术潮流对海地革命史学的影响,亦未论述革命史学的流变。^② 2020年,杰里米·D. 波普金详细论述了海地革命研究的新进展,并提及海地革命的“跨国转向”,对了解海地革命史学意义重大。^③ 国内学界对海地革命的研究屈指可数,^④ 庞冠群对近年海地革命研究的动态做过有益介绍,囿于主题,文章主要是在与法国革命的互动层面简述海地革命研究。^⑤ 张旭鹏在全球思想史视野下考察“革命”的内涵与变形时,认为海地革命孕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和普遍人权理念与欧洲革命观念相互影响,革命不仅克服了抽象的普遍主义,还获得了更加真实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普遍性,有助于学界认识海地革命的世界意义。^⑥

拙文拟结合时代政治和史学潮流演变,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研究路径及其转向为切入点,概述海地革命研究的学术史,进而管窥时代政治、史学思潮和法国革命史学对海地革命研究的影响。笔者认为,海地革命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种族叙事”到“阶级叙事”,再到“大西洋转向”的转变,且每种叙事主导了相当长时间的海地革命史研究。^⑦

① Michel Hector, “L’historiographie haïtienne après 1946 sur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293 – 294, 1993, pp. 545 – 553.
 ② David Geggus, “Thirty Years of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iography”, *Revista Mexicana del Caribe*, Vol. 3, No. 5, 1998, pp. 178 – 197.
 ③ Jeremy D. Popki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omes of Age: Ten Years of New Research”, *Slavery & Abolition*, Vol. 42, No. 2, 2020, pp. 382 – 401.
 ④ 国内学界关于海地革命的研究,参见李春辉:《海地革命(1790 – 1804)——拉丁美洲第一个黑人国家的成立》,《历史教学》1965年第7期;王春良:《海地革命领袖杜桑·卢维都尔》,《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陆俊国:《论海地革命的特点和性质》,《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金重远:《海地革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赵佳琳:《法国大革命废奴运动中克劳德·米尔桑的主张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年。另外,一些专著的章节也论及海地革命,参见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罗荣渠:《美洲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庞冠群:《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⑥ 张旭鹏:《“革命”的内涵与变形:一项全球思想史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⑦ 笔者关于海地革命史研究从“种族叙事”到“阶级叙事”,再到“大西洋转向”的转变的划分受到莫莱菲·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的启发,但完全不同于阿桑特从“阶级叙事”“宗教叙事”和“文化叙事”的立场来解释海地应对自然灾害的语境和内涵。除海地革命史研究的“阶级叙事”外,“种族叙事”和“大西洋转向”则是笔者自己的总结。阿桑特的研究,参见 Molefi Kete Asante, “Haiti: Three Analytical Narratives of Crisis and Recovery”,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42, No. 2, 2011, pp. 276 – 287.

一、海地革命史的种族叙事

革命后的海地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权,面临国外的干涉封锁和国内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1806年,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被刺杀后,海地南北分裂,北部是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的“海地国”或“海地王国”,南部是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的“海地共和国”。在此情况下,实现国家统一安定,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就成了海地的首要任务,这种时代背景影响了海地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革命叙事。他们通过强调殖民统治的残暴和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地位,彰显海地革命及海地国家的合法性,忽视了黑人大多数(black majority)的革命贡献。因此,这种革命叙事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即海地革命史研究的“种族叙事”。^①

尽管国际学界没有海地革命史研究的“种族叙事”一说,但笔者通过有限的阅读认为,一些有关海地革命的论著存在明显种族倾向,这在海地第一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尤为明显。海地革命史研究的“种族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过分夸大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作用,贬低黑人奴隶的革命能动性;强调自由有色人种在革命中对财产的保护以及对秩序的维护,展示黑人奴隶在革命中的破坏性;把黑人奴隶置于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下,同时证明海地革命和海地国家的合法性;以朴素的民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海地独立后,大西洋两岸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叙事性政治史。^②早期海地政论作家茹斯特·尚拉特(Juste Chanlatte)、瓦斯泰男爵(Baron de Vastey)和埃拉尔·杜梅斯勒(Hérard Dumesle)出版了海地革命题材的著作,但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海地革命的历史研究。尽管他们观点各有不同,但在忽视黑人革命贡献方面却惊人地相似。相比之下,埃拉尔·杜梅斯勒对革命中的黑人奴隶更具包容性。^③尽管早期海地革命史学有把奴隶融入革命叙事的企图,但与自由有色人种相比,奴隶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这在海地历史学两位奠基人托马·马迪乌(Thomas Madiou)和博布伦·阿杜安(Beaubrun

① 革命前夕的圣多明各人口由三万白人殖民者、大约三万自由有色人种以及约五十万黑人奴隶组成,他们之间等级森严,白人歧视自由有色人种,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共同剥削压迫黑奴,而每一种族内部又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致使种族歧视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法国革命引发的关于自由有色人种公民权问题的讨论,最终导致樊桑·奥热(Vincent Ogé)于1790年10月领导大约三百名自由有色人种起义,反抗殖民地政府。参见雅克·索雷:《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黄艳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70—82页。

② 法语世界的著作对海地独立主要持批评态度,认为海地独立是一种悲剧,参见Antoine Dalma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Tome 1-2, Mame frères, 1814; Pamphile de Lacroix,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Tome 1-2, Pillet Aîné, 1819; 也有持支持和同情态度的,参见Antoine Métral, *Histoire de l'insurrection des esclaves dans le nord de Saint-Domingue*, Delaunay, 1818。英语世界的著作有对海地独立持批评态度的,参见James Franklin, *The Present State of Hayti*, John Murray, 1828; 也有以乐观和普遍同情的立场对待独立的海地及其统治者,参见Jonathan Brown,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St. Domingo*, William Marshall, 1837。

③ 有关海地建国之初海地政论家关于革命题材的介绍,参见Erin Zavitz, “Revolutionary Narrations: Early Haiti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llenge of Writing Counter-history”, *Atlantic Studies*, Vol. 14, No. 3, 2017, pp. 336 - 353;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1。

Ardouin)的著作中也有明显体现。^①

19世纪40年代,海地第一位历史学家托马·马迪乌在其撰写的三卷本历史著作《海地史》^②中介绍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807年海地的历史,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海地革命。他试图把奴隶纳入革命叙事中,修复革命中伟大的黑人英雄的声誉,特别是杜桑·卢维杜尔,并将革命描绘成一场反对奴隶制压迫的起义。然而,他作为混血精英阶层,又以一种负面的语言描述奴隶的行为,认为没有自由有色人种精英的领导,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对奴隶的鄙视和对奴隶负面形象的描述在文中频繁出现,在他对北部奴隶起义和西部自由有色人种起义的比较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无感慨地说:“西部省由自由有色人种领导的奴隶起义和北部省奴隶自己领导的奴隶起义是多么不同啊!一方面是秩序,尊重财产,没有一个人死亡。另一方面是混乱、抢劫和可怕的报复。”除此之外,他还悲叹地论及奴隶们的无知,“起义者抢过大炮,拥抱了起来。他们被杀时都没有松手。另一些人把胳膊伸进大炮里,阻止炮弹飞起来,并对他们的战友喊道:来吧,来吧,我们得到它们了!大炮开火了,躯体炸得粉碎。”^③托马·马迪乌笔下的奴隶不可能成为海地革命的主体,不可能领导海地独立,只有在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用现今眼光来看,他的观点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强调自由有色人种的贡献而贬低黑人奴隶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海地革命的事实。然而,托马·马迪乌的研究为当时西方了解海地革命和增强海地的民族自信做出了一定贡献。

海地革命史研究的种族叙事在同时代的海地历史学家博布伦·阿杜安的研究中也有明显体现。他在《海地史研究》中将海地历史划分为法据时期(*la période française*)和海地时期(*la période haïtienne*),但作者只记叙革命的事实,它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止于1803年11月法国重新征服海地企图的破灭。^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圣多明各所有动乱和革命的原动力(*la cause motrice*),圣多明各的各阶层自由人利用宗主国的革命夺取他们的权利。此外,他将革命的开始归功于富裕的自由有色人种,而不是领导奴隶起义军的黑人。他把西部省的奴隶当作黑白混血儿及自由黑人领导起义军的辅助力量,并把这些自由有色人种视为奴隶的“天生的保护者”。^⑤博布伦·阿杜安与托马·马迪乌一样,没有看到不同区域革命的差异性,也忽视了革命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黑人奴隶实际在北部省和1793年6月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像富有的自由有色人种樊桑·奥热(*Vincent Ogé*)和朱利安·雷蒙(*Julien Raimond*)等人,他们与白人种植园主一样,拥有自己的种植园和奴隶。在革命初期,他们企图与白人种植园主合谋,继续把黑人奴隶置于奴隶制的枷锁下,自由有色人种是奴隶的天生保护者一说显然站不住脚。同时,阿杜安还认为奴隶能够理解自由的概念,不仅因为“自由的情感(*le sentiment de la liberté*)”在从非洲被带到圣多明各成为奴隶的黑人中一

① 关于托马·马迪乌和博布伦·阿杜安在海地史学的奠基地位,参见 Michel Hector, “L’historiographie haïtienne après 1946 sur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p. 545.

② Thomas Madiou, *Histoire d’Haïti*, Tomes 1-3, Henry Deschamps, 1847-1848.

③ Thomas Madiou, *Histoire d’Haïti*, Tome 1, p. 101.

④ Beaubrun Ardouin, *études sur l’histoire d’Haïti*, Tome 1, p. 5.

⑤ Beaubrun Ardouin, *études sur l’histoire d’Haïti*, Tome 1, p. 204.

直不断地流露着”,而且“直到圣多明各革命,黑人(奴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对自由的热爱在他们身上和在其他人身上一样强大”。^①对阿杜安来说,承认奴隶对自由的热爱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肩负起领导海地革命的重任,起义还需“逃避在山里的奥热团伙^②的前成员的帮助”和“杜桑·卢维杜尔的中间连络”,尽管“奴隶利用各方的倾向作为辅助和工具,通过战斗实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③不难发现,博布伦·阿杜安在论述奴隶在革命中的作用时显得有些矛盾,他最终把革命归结为自由有色人种的领导。

有关奴隶在革命中作用的模糊观点或对奴隶的轻视反映了19世纪海地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在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非洲血统的混血知识分子为证明海地革命和海地国家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歌颂了黑人奴隶在革命中的成就。然而,为反驳白人出版物对海地革命的污名化,他们必须根据欧洲标准定义文明和进步,用以欧洲为中心的修辞来论证海地革命的正当性,这就导致其在论述奴隶的革命贡献时显得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④海地建国后,虽然奴隶制废除并建立了“黑人共和国”,但并没有实现革命者宣称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权力和财富仍掌握在前自由有色人种和革命中崛起的新的军事贵族精英手中,作为前奴隶的黑人依旧处于底层,遭受某种程度的剥削和压迫。托马·马迪乌和博布伦·阿杜安作为自由有色人种精英,对黑人的歧视难免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另外,他们著作成书的年代正值从黑人总统变为皇帝的福斯坦·苏鲁克(Faustin Soulouque)统治时期,苏鲁克对混血精英的清洗可能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黑人统治的不满。因此,他们的革命叙事突出自由有色人种,特别是革命领导人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种族和精英主义色彩,影响了后世的革命叙事。^⑤

20世纪初,特别是美国占领海地期间(1915—1934年),海地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关海地革命研究的小高潮。1924年,海地成立了海地历史和地理协会(Société haïtienn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对推动海地历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奥拉斯·保莱于斯·萨农在20世纪20年代根据未利用的法国档案、当时的报纸和手稿以及海地的家庭档案资料撰写了一部三卷本的《杜桑·卢维杜尔传》。^⑥该著作成书时正值美国占领海地期间,它既是对海地民族自豪感的赞扬,也是对海地革命及其领导人的遗产的体现,更是对这场革命研究的重大贡献。在奥拉斯·保莱于斯·萨农笔下,海地革命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已成为重新获得民族自信的手段,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此外,阿尔弗雷德·内穆尔的《圣多明各独立战争的军事史》^⑦和《杜桑·卢维杜尔之囚禁和死亡的历史:我的茹堡朝圣》,^⑧还

① Beaubrun Ardouin, *études sur l'histoire d'Haïti*, Tome 1, pp. 216 – 217, 220.

② 奥热团伙是指奥热起义失败后,逃避殖民政府追捕的起义者。

③ Beaubrun Ardouin, *Études sur l'histoire d'Haïti*, Tome 1, pp. 220, 226 – 228, 232.

④ Erin Zavitz, “Revolutionary Narrations: Early Haiti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llenge of Writing Counter-history”, pp. 347 – 348.

⑤ Michel Hector, “L'historiographie haïtienne après 1946 sur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pp. 545 – 546.

⑥ Horace Pauléus Sannon, *Histoire de Toussaint Louverture*, Tomes 1 – 3, Héraux, 1920 – 1933; Horace Pauléus Sannon, *L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Chéraquit, 1925.

⑦ Alfred Nemours,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de Saint-Domingue*, Tomes 1 – 2, Berger Levrault, 1925 – 1928.

⑧ Alfred Nemours, *Histoire de la captivité et de la mort de Toussaint Louverture: Notre pèlerinage au fort de Joux*, Berger Levrault, 1929.

有安托万·米歇尔的《埃杜维尔将军在圣多明各的使命》^①属于传播以种族为中心的民族历史观点的著作,几乎完全限于政治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早期海地革命史种族叙事的继承,体现了海地革命研究种族—精英叙事的持久影响力。

二、海地革命史的阶级叙事

海地作为法国的前殖民地,其革命涉及帝国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奴隶制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这场革命变得尤为复杂。要理解这场革命,也需要可行的解释路径或切入点,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创的阶级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让·饶勒斯在《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中涉及经济利益和阶级解释的问题,但主要针对法国革命而言。^②真正开创海地革命史“阶级叙事”的是特立尼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③1938年他出版了经典作品《黑色雅各宾派:杜桑·卢维杜尔和圣多明各革命》,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海地革命的开山之作,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④詹姆斯是特立尼达的黑人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黑人解放运动充满热情,为西印度群岛的独立而奔走。他认为,了解海地革命的历史对鼓舞黑人斗志,推动反殖民主义运动至关重要。此外,法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兴起的经济社会解释和阶级解释影响了他对海地革命的认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当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和革命运动的现实关注透视海地革命,期望用过去黑人革命的经验指导当下和预见未来。他对海地革命的研究产生了持久影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有以下方面。

首先,詹姆斯批判殖民地奴隶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讴歌海地革命及其领导人。他认为这场革命是进步理想的历史性胜利,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起义。正如詹姆斯所说:“将在一个白人面前战战兢兢的成百上千的奴隶们变成能够组织起来并击败当时最强大的欧洲国家的民族,是革命斗争和成就的伟大史诗之一。”^⑤他还认为在北部省制糖厂生活劳作的被压迫的奴隶群体比当时任何工人团体都更接近“现代无产阶级”。因此,北部奴隶起义“是一场准备充分、有组织的群众运动”。^⑥他还为奴隶起义造成的破坏开脱。奴隶们破坏多,是因为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

① Antoine Michel, *La mission du Général Hédouville à Saint-Domingue*, La Presse, 1929.

② 饶勒斯关于法国大革命中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参见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1卷,陈祚敏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6—249页。

③ 莫莱菲·凯特·阿桑特在论及海地的阶级叙事时,谈到了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的开创性贡献,参见 Molefi Kete Asante, “Haiti: Three Analytical Narratives of Crisis and Recovery”, pp. 278–279。有学者认为詹姆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参见 Charles Forsdick and Christian Høgsbjerg,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Black Jacobins”, in Charles Forsdick and Christian Høgsbjerg, eds., *The Black Jacobins Read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还有学者认为詹姆斯的著作是对海地革命的经典解释,参见 David Geggus, “Thirty Years of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iography”, p. 180。

④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Vintage Books, 1989.

⑤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x.

⑥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85–86.

摧毁它们”。^①他进一步辩白说,即使他们有针对性对白人的血腥和残忍的疯狂行为,那也比他们的主人过去对他们的态度要仁慈的多。在革命中,他们放过了许多被他们突袭的种植园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②此外,他也为革命领导人辩护,认为杜桑·卢维杜尔的失败在于方法,而不是原则。^③当然,各阶级的行动受经济利益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伟人也不例外,“伟人创造历史,但只创造他们能创造的历史。他们取得成就的自主权受到所处环境的限制”。这显然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看法是一致的。^④

其次,詹姆斯将海地革命置于当地社会历史和法国革命的背景下,认为没有法国革命就没有海地革命,海地革命是法国革命的结果。他指出,海地革命不仅是在世界体系边缘一个小岛上发生的鼓舞人心的斗争,而且与法国革命始终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推动了宗主国的革命进程,并为人权概念赋予了新的普遍意义。^⑤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国内对绝对君主制的攻击,引起了殖民地种植园主的纷纷效仿。^⑥同时,殖民地问题也涉及自由有色人种权利问题,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斗争唤醒了沉睡的奴隶,从而引发了奥热起义。^⑦詹姆斯认为“奴隶起义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承认这样的事情”,直到巴黎民众被革命唤醒,以及海地奴隶对奴隶制十分憎恶并对自由的热情高涨情况下,奴隶制才有可能被废除。^⑧

最后,詹姆斯认为,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影响革命进程的主要力量。^⑨他在文中多次解释海地革命有关问题,表示阶级问题比种族问题更重要。就革命进程中黑白混血儿对奴隶大众的态度来看,也反映了“这不是肤色问题,而应大致当作阶级问题”。^⑩他认为“种族问题从属于政治上的阶级问题,从种族的角度来思考帝国主义是灾难性的。然而,把种族因素仅当作次要因素而忽视的错误,只比把它当作根本因素的错误稍微轻一些。”^⑪他对海地直到1793年8月才废除奴隶制是因为种族歧视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奴隶制的废除。^⑫为进一步论证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他说道:“如果君主主义者是白人,资产阶级是棕色人,法国民众是黑人,那么法

①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88.

②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88 - 89.

③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283.

④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x;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⑤ Charles Forsdick and Christian Høgsbjerg,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Black Jacobins”, in Charles Forsdick and Christian Høgsbjerg, eds., *The Black Jacobins Reader*, p. 13.

⑥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58 - 60.

⑦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73 - 74.

⑧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95, 125.

⑨ Rebecca DeWolf, “Breaking the Silence: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ttps://outfithetower-rebeccadewolf.com/?p=274#_ftn8 [2023 - 05 - 17]

⑩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165 - 166.

⑪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283.

⑫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p. 127 - 129.

国革命将作为一场种族战争载入史册。虽然他们在法国都是白人,但他们照样打仗。”^①詹姆斯的言外之意是,圣多明各的斗争更多是因为阶级,而不是种族。

詹姆斯的海地革命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相当时间内主导了英语世界的海地革命研究,同时也在法语世界产生了影响。^② 尽管他对海地革命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也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③但他的研究是英语世界海地革命研究的重要著作,在今天仍有影响。这不仅说明了詹姆斯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海地革命的忽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对埃里克·威廉姆斯和卡罗琳·菲克等后世史家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埃里克·威廉姆斯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奠定了他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研究方面的地位,其核心观点“经济利益决定论”影响深远。^⑤ 尽管他没有海地革命史研究的专著,但对早期资本主义与奴隶贸易、奴隶制、加勒比史的研究中仍包含对法国革命与海地革命中废奴运动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英属北美独立后,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蔗糖生产的突飞猛进,使法国在世界贸易中逐渐获得有利地位。时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想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贸易搞垮圣多明各,进而鼓动和支持法国废奴运动。法国革命的爆发为英国介入圣多明各和向风群岛的殖民地提供了机会。^⑥ 这不仅体现了海地废奴中的经济因素,也体现了帝国争霸对海地革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埃里克·威廉姆斯的研究是对詹姆斯阶级解释的继承和发展。与后者不同的是,威廉姆斯有摒弃废奴运动中道德因素的倾向。^⑦ 威廉姆斯从经济利益层面研究海地革命及废奴运动是理解此事件的钥匙,但绝对化经济因素,显然犯了把历史事件简单化和机械化的错误。

如前所述,詹姆斯对美国历史学家卡罗琳·菲克的《缔造海地:来自底层的圣多明各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⑧ 卡罗琳·菲克是新社会史领域的重要学者,着重从底层人群的角度书写海地革命史。与詹姆斯重点关注“黑色雅各宾派”,特别是革命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不同,她主要关注奴隶和黑人民众在革命中的作用。^⑨ 她认为在废除奴隶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中,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民

①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128.

② 关于詹姆斯的海地革命研究的影响,参见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Beyond ‘The Black Jacobins’: Haitian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Comes of Age”, *Journal of Haitian Studies*, Vol. 23, No. 1, 2017, pp. 4–34.

③ 莫莱菲·凯特·阿桑特批评了詹姆斯的阶级解释的不足,参见 Molefi Kete Asante, “Haiti: Three Analytical Narratives of Crisis and Recovery”, pp. 278–27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普通大众的历史作用,而詹姆斯重视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作用,参见 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p. ix。

④ 李安山:《资本主义与奴隶制——50年西方史学争论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⑤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pp. 208, 210;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492–1969*, Vintage Books, 1970, pp. 239–245, 255–256, 261–262.

⑥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pp. 145–149; Eric Williams,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492–1969*, pp. 224–245, 248–250.

⑦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pp. 136, 211.

⑧ Carolyn Fick,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and the Making of Haiti”, in Charles Forsdick and Christian Høgsbjerg, eds., *The Black Jacobins Reader*, pp. 60–69.

⑨ Carolyn Fick,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and the Making of Haiti”, p. 67; David P. Geggus, “Thirty Years of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iography”, p. 185.

众经常发挥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①另外,她还重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圣多明各南部省的事件,认为南部省在革命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菲克揭示了自由有色人种、种植园劳工和好战分子间的互动,认为这影响了革命的进程。^②总的来说,詹姆斯与菲克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菲克侧重于社会史和基层群体,强调社会动态和底层群众的影响,而詹姆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国际政治对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强调领导者的作用和革命的国际意义。二者的研究相辅相成,为研究海地革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维度。

关于海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就不得不提到法国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③的研究,他在1961年出版的《杜桑·卢维杜尔:法国革命与殖民地问题》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了法国革命与殖民地问题的关系及杜桑·卢维杜尔的作用。他认为存在一场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殖民地革命,过去史学研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把海地的革命简单当作法国革命的一个篇章。正如他指出的:“在法属殖民地没有‘法国革命’。在每个法属殖民地都有一场法国革命背景下产生的与它有联系的独特革命,但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和目标发展。”^④他认为法国革命为殖民地各阶层人民实现其特殊要求和心中的自由提供了机会,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法国革命政权不能满足殖民地社会对自由的要求,拒绝授予自由有色人种公民权和解放奴隶。殖民地各阶层人民认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只给予白人种植园主政治或经济自由,却把黑白混血儿置于他们的枷锁之下”,他们也“不能承认自由有色人种在公民方面的权利,同时又把黑人留在地狱”。^⑤在他们的观念中,解放一个阶层必然导致另一个阶层的解放,进而解放所有人。^⑥艾梅·塞泽尔的研究对法国学界了解海地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加布里埃尔·德比安(Gabriel Debien)关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奴隶制的研究也可置于马克思主义解释范畴内。^⑦他在1974年出版的《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一书中用社会史的方法,证实了被压榨的奴隶是海地革命的核心,^⑧在某种程度与詹姆斯等人的观点相似。

另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有关海地革命的研究也值得重视。他以研究近代奴隶制的兴衰著称,试图构建一种关于美洲不同地区解放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叙事。^⑨他没有海地革命的专著,但在专著中用两章的篇幅论述与海地革命有关的内容。另外,他在《海地、奴隶制与民主

① Carolyn Fick, *The Making of Haiti: The Saint Domingue Revolution from Below*, pp. 1, 9 – 11.

② 关于南部不同群体在海地革命期间的作用,参见 Carolyn Fick, *The Making of Haiti: The Saint Domingue Revolution from Below*, pp. 137 – 236; Carolyn E. Fick, “The Saint Domingue Slave Revolution and the Unfolding of Independence, 1971 – 1804”, in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p. 188 – 192.

③ 艾梅·塞泽尔于1946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脱离共产党,但他的研究依旧展现了经济利益分析,以及经济基础对殖民地政策的影响,因而笔者把他纳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

④ Aimé Césaire,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résence Africaine, 1981, p. 24.

⑤ Aimé Césaire,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 342.

⑥ Aimé Césaire,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p. 56 – 64, 154, 342.

⑦ David P. Geggus, “Gabriel Debien (1906 – 1990)”,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1, No. 1, 1991, pp. 140 – 142.

⑧ Gabriel Debien, *Les esclaves aux Antilles français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Guadeloupe, 1974.

⑨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 – 1848*, Verso, 1988, p. 27.

革命的时代》一文中论述了民主革命时代海地与奴隶制的兴衰。^① 从中可以看出,罗宾·布莱克本的海地革命研究主要有三个要点:把海地革命置于帝国竞争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各阶层利益角逐的背景下考察,凸显海地革命的国际因素和复杂性;认为废奴主义在废奴过程中的影响有限,旧制度的崩溃和捍卫殖民地的利益需要促使了奴隶制的废除;海地革命是大西洋废奴史和民主革命时代的重要事件,对大西洋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罗宾·布莱克本的海地革命研究突出了其对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他的研究对理解海地革命及其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做了有益探索,预示着海地革命史研究“大西洋转向”的到来。

总而言之,在詹姆斯开创的海地革命的“阶级叙事”的基础上,菲克运用新社会史的方法,注重“从底层书写历史”,重视革命民众“黑奴”的作用,真正体现了群众史观。艾梅·塞泽尔和加布里埃尔·德比安与他们一起发展了海地革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揭示了海地革命的复杂性和更多面相。值得注意的是,艾梅·塞泽尔指出海地革命的独特性,将其视为独立课题而非附着于法国革命的现象,这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潜在倾向,与其反殖民主义及黑人国际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他与詹姆斯一样,作为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先驱,希望通过海地革命研究为黑人运动提供智力支持。他关注到的海地革命的自身特性是其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重要条件,也是海地革命史“大西洋转向”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罗宾·布莱克本关于海地革命的复杂性和海地革命在大西洋史上重要影响的论断预示着这一研究领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即海地革命史研究“大西洋转向”的到来。

三、海地革命史的“大西洋转向”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莉莎·戈德斯坦·塞平沃尔所说,海地革命研究并没有随着詹姆斯的研究而复兴。^② 相反,西方学界长期忽视海地革命。^③ 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这不仅与后殖民理论、语言转向、全球史和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有关,而且与1989年法国革命200周年和1994年法国首次废除奴隶制200周年等纪念活动推动关于奴隶制的讨论有关。2004年海地独立200周年纪念后,海地革命受到更多关注。^④ 在此情况下,海地革命研究不再“沉默”,并形成了一个

① Robin Blackburn, “Haiti, Slavery, and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63, No. 4, 2006, pp. 643–674.

②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Beyond ‘The Black Jacobins’: Haitian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Comes of Age”, p. 5.

③ Thomas Reinhardt, “200 Years of Forgetting: Hushing up the Hait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5, No. 4, 2005, pp. 246–261; Michel-Ralph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Beacon Press, 1995, pp. 95–107; Philippe R. Girard,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y’s New Frontier: State of the Scholarship and Archival Sources”, *Slavery & Abolition*, Vol. 34, No. 3, 2013, p. 486.

④ 菲利普·吉拉尔认为法国学者对海地革命的兴趣始于1994年法国首次废除奴隶制的200周年纪念,而美国学者的兴趣可能归因于大西洋史潮流,参见 Philippe R. Girard,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y’s New Frontier: State of the Scholarship and Archival Sources”, pp. 486, 492. 阿莉莎·戈德斯坦·塞平沃尔也论及法国的政治纪念活动对海地革命史研究的影响,参见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Beyond ‘The Black Jacobins’: Haitian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Comes of Age”, p. 9;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The Specter of Saint-Domingue: American and French Reactions to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 324; Léon-François Hoffman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French Literature”, in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 340.

新的研究领域“海地革命史”。^①一般而言,与之前研究相比,近二十年的海地革命研究强调大西洋维度,甚至全球性因素,它的起源、进程和影响超越了民族国家或宗主国—殖民地叙事,这即是海地革命研究的“大西洋转向”。^②

1988年,法国史家伊夫·贝诺出版了研究法国革命时期宗主国—殖民地互动的典范作品,他在书中论证了殖民地的奴隶制问题对法国革命进程及诸多意识形态和法律影响的重要性。^③伊夫·贝诺的研究是对以往法国革命史学家对海地革命“遗忘”(oubli)的纠偏,^④激发了法国学界研究奴隶制问题及海地革命的兴趣。^⑤另外,伊夫·贝诺的研究也反映了法国革命史家研究殖民地和海地革命的路径,侧重宗主国—殖民地的互动。其实,这在让-达尼埃尔·皮凯2002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期间的黑奴解放(1789—1795年)》中也有体现。^⑥他深入探讨了法国革命者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包括他们在表决废除奴隶制问题上的犹豫,拿破仑重新控制殖民地的企图,以及圣多明各革命和法国革命间的联系。废除奴隶制不是所有人平等意识的一致性所致,而是对国外入侵和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必要反应。^⑦弗雷德里克·雷让是研究法国革命史和殖民地奴隶制史的又一位重要学者,他在《奴隶制和殖民地》一文中通过各派别在自由有色人种的地位、奴隶制问题及宪法对殖民地适用方面的较量,简要介绍了奴隶制和殖民地问题对法国革命政府殖民地政策的影响。^⑧此外,他在《法国革命,加勒比海革命》一文中论述了法国和加勒比地区在贸易条件和个人权利上的相互作用,加之革命政府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战争武器,进而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⑨总之,海地革命史研究的民族国家或宗主国—殖民地叙事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法国的殖民政策、经济体系、奴隶制度、殖民地社会的构成,以及殖民地体系如何影响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条件;宗主国与殖民地不同种族群体间的互动,特别是黑奴、白人殖民者、自由有色人种等;法国革命对海地的影响,包括法国革命的思想 and 政治动力如何传播到海地,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了海地革命的爆发;海地革命对宗主国法国的影响,包

① 关于对海地革命研究“沉默”结束的论断,参见 Robin Blackburn, “Epilogue”, in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 393。关于海地革命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论述,参见马伟军:《罗伯特·帕尔默的“大西洋革命”观与当今大西洋史研究》,《全球史评论》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0—51页。

② 法国学者雅克·索雷(Jacques Solé)认为海地革命是“大西洋革命”的组成部分。参见雅克·索雷:《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第68页。

③ Yves Béno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in des colonies*, La Découverte, 1988.

④ Yves Béno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in des colonies*, pp. 205—217.

⑤ Marcel Dorigny, Bernard Gainot,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1788—179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UNESCO, 1998。克劳德·汪凯研究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度洋殖民地留尼汪岛和法兰西岛的废奴情况,参见 Claude Wanquet, *La France et la première abolition de l'esclavage: 1794—1802: Le cas des colonies orientales Ile de France (Maurice) et La Réunion*, Karthala, 1998。

⑥ Jean-Daniel Piquet, *L'Emancipation des Noirs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5)*, Karthala, 2002.

⑦ 有一点需要说明,并非仅有法国史家研究宗主国—殖民地或中心与边缘的互动,美国史学家也可能是受法国学者研究的影响有同样倾向,在此略举两例,参见 Carolyn Fick,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aint Domingue: A Triumph or a Failure?”, in David Barry Gaspar and David P. Geggus, eds., *A turbulent Tim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er Caribbe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1—70; David Brion Davis, “Impact of the French and Haitian Revolutions”, in David P.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001, pp. 3—8.

⑧ Frédéric Régent, “Slavery and the Colonies”,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pp. 397—415.

⑨ Frédéric Régent, “Revolution in France, Revolutions in the Caribbean”, in Alan Forrest and Matthias Midd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 Routledge, 2016, pp. 61—74.

括海地革命的消息在法国及其加勒比殖民地的传播和法国的反应,海地革命如何影响法国革命的进程。他们的研究拓展了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研究的视角与内容,殖民地革命成了法国革命研究的组成部分。

21 世纪,海地革命史家不仅在宗主国—殖民地或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路径下,而且在新视野下审视海地革命,表现为明显的“大西洋转向”。这是海地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艾梅·塞泽尔关于海地革命独特性的强调,特别是罗宾·布莱克本把海地革命置于民主革命时代和大西洋废奴运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体现了海地革命的国际性。其二,海地革命史研究的宗主国—殖民地叙事对宗主国与殖民地互动的研究本身具有转向的倾向,这是由宗主国与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密切联系和地理位置决定的,研究这一课题势必会体现朦胧的“大西洋视野”。其三,全球史和大西洋史研究的发展为海地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全球史视野使研究者将事件置于全球范围内考察,而不仅局限于某个区域,进而探究海地革命如何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大西洋史是一种强调大西洋地区不同国家间相互联系和互动的研究方法。对海地革命史研究来说,新视角强调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在革命中的角色,以及它们如何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在全球史和大西洋史潮流下,研究者把海地革命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使其地位显著提升,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事件从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变为探索法国革命进程的必要研究对象,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① 就 18 世纪的圣多明各或海地来说,它的革命更具有“大西洋性”。在“大西洋转向”下,海地革命研究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戴维·P. 格古斯和杰里米·D. 波普金为代表的海地革命史家在研究海地革命时,强调革命的“大西洋性”。2001 年,戴维·P. 格古斯主编的文集《海地革命在大西洋世界的影响》^②运用“大西洋视野”,论述了海地革命在大西洋世界的影响及其源源不断的遗产。^③ 海地革命的消息通过水手、难民和私掠船传向四面八方,在法国、美国、英国和拉丁美洲产生了回响。美国因圣多明各难民问题而对法国革命转向保守,政治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日益增长。同时,因革命废奴引起了白人种植园主的恐惧,担心自己的奴隶模仿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直接影响了以后其他地区的废奴进程。当然,海地革命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大西洋世界的废奴运动存在争议。^④ 尽管如此,戴维·P. 格古斯

① David Andress, “Atlantic Entanglements: Comparing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Revolutions”, in Alan Forrest and Matthias Midd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 p. 160; Laurent Dubois, “An Atlantic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2, No. 4, 2009, pp. 556 – 561.

② David P.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001.

③ 关于海地革命在大西洋世界的文化遗产,参见 Doris Garraway, ed., *Tree of Liberty: Cultural Legacies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8. 关于海地革命的大西洋影响,参见 Alain Saint-Victor, “Signification et impact de la Révolution haïtienne sur le monde atlantique”, <http://histoireengagee.ca/?p=1568> [2023 - 03 - 24]

④ David P. Geggus and Norman Fiering, ed., *The World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关于海地革命对废奴进程的争议性影响,参见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p. 28;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Wiley-Blackwell, 2011, p. 4; David Brion Davis, “Impact of the French and Haitian Revolutions”, in David P.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pp. 5 – 6; Seymour Drescher, “The Limits of Example”, in David P.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pp. 11 – 12; Robin Blackburn, “The Force of Example”, in David P.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pp. 18 – 19;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以1815年亚历山大·佩蒂翁向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提供援助及后来玻利瓦尔废奴为例,认为海地确实为新世界废除奴隶制和非殖民化做出了重大贡献。^①杰里米·D.波普金认为海地革命阻碍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废奴,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而不是加快奴隶制的消亡。圣多明各的难民把他们高效的制糖方法带到古巴和巴西,建立了新的生产中心,使这两个国家成为美洲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地方。^②

其次,海地革命对美国政治及政治文化的影响成为海地革命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海地革命对美国的影响是美国史学界传统研究领域,最早由美国外交史家开创。^③后来,阿尔弗雷德·亨特和马修·J.克拉文论述了海地革命对内战前后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④近年,以阿什莉·怀特和詹姆斯·亚历山大·丹为代表的学者从海地革命对美国早期政治及文化影响的角度研究海地革命,进一步彰显了海地革命的重要性。2010年,阿什莉·怀特在《遭遇革命:海地和早期共和国的形成》中考察了美国人对圣多明各难民的反应,阐释海地革命如何塑造了早期美国。^⑤圣多明各的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将共和主义的理想推向了一个激进的结论,即所有人,不论什么种族,都是自由、平等的,并有权享有公民权利。海地流亡者是这一主张产生影响的显著例子,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存在迫使不同群体、不同派别的美国人思考海地革命对他们国家可行性的影响。2016年,詹姆斯·亚历山大·丹在《危险的邻居:在美国早期制造海地革命》一书中以海地革命的消息在费城的传播为切入点,论述了美国对海地革命的认知和反应。^⑥美国人在解释圣多明各革命的同时,也在解释他们自己的革命及影响。在这些讨论中,圣多明各本身成了一个参照,一个以简洁形式承载着美国政治思想的容器,塑造了美国早期政治文化。2016年,伊丽莎白·马多克·迪伦和迈克尔·J.德雷克斯勒主编的《海地革命和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论述了海地革命与美国早期的互动,这其中涉及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拿破仑在圣多明各的失败及美洲帝国梦想的破灭是出售路易斯安那的重要原因,这也影响了美国后来的发展。^⑦

再次,在“大西洋转向”中,比较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与海地革命成为可能。海地革命不再是一个孤立事件和研究领域,它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就海地革命的起源而言,它受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影响。戴维·P.格古斯认为美国革命对海地革命的爆发产生了影响,自由有色人种组成的特别军团去佐治亚参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斗争,在美国获得的军事经

①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p. 27.

②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p. 3–5.

③ Philippe R. Girard,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y’s New Frontier: State of the Scholarship and Archival Sources”, p. 491.

④ Alfred Hunt, *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 Slumbering Volcano in the Caribbea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tthew J. Clavin,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Second Haiti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⑤ Ashli White, *Encountering Revolution: Haiti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rly Republi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0.

⑥ James Alexander Dun, *Dangerous Neighbors: Making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Early Ame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⑦ Elizabeth Maddock Dillon and Michael J. Drexler, eds.,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Earl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验及观念为他们后来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做了准备。^①此外,他认为海地革命与法国革命共生发展,相互影响,但这种相互作用显然是不平衡的。海地革命对宗主国革命中的殖民地政策影响不大,而如果没有法国革命造成的政治混乱和思想动荡,圣多明各的任何起义都不太可能发展成一场革命。^②另一方面,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比,海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启蒙思想家宣称的自由和平等,是革命时代最激进的政治变革。劳伦·杜波伊斯认为海地革命是黑人革命成功的独特例子,它是18世纪至19世纪政治、哲学和文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地革命创造了一个所有人获得自由和公民权的社会,从而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它是美洲废除奴隶制的核心,是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为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争取人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③杰里米·D.波普金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海地革命打击了奴隶制和种族等级制度,而1787年起草的美国宪法虽提及自由,但没有废除奴隶制,即使自由黑人也被剥夺了公民的全部权利。相反,海地1805年颁布的宪法宣称“奴隶制将被永久废除”,并且不同人种间的“所有肤色歧视必须停止”。海地革命反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立场使其成为美洲反对欧洲统治的最激进的革命起义。^④虽然法国革命者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这里的“人”不包括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人权和公民权是有条件的。正是通过海地奴隶起义者的战斗,他们为抽象的权利话语赋予了新的普遍性内容,当他们要求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和种族平等时,扩大了政治文化的范围,重新塑造了法兰西共和主义。^⑤与上述观点不同,戴维·P.格古斯对海地革命的共和性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场由奴隶起义发展而来的革命远非“民主理想”驱动,而从头到尾是专制的。从1791年起义中脱颖而出,后来将圣多明各带上独立道路的一批有才能的前奴隶,从未表现出丝毫对民主的尊重。海地革命的领导人是反对奴隶制,但不是自由主义者。^⑥他的论断对当下过高评价海地革命无疑是一个警告。

最后,在新的研究视野下,科学、启蒙与革命的关系成了海地革命研究中的重要话题。有学者指出,在1763年至1789年间,圣多明各精英阶层与宗主国的人民一样关注公民身份、科学、社交、性别、宗教和改革等问题。殖民者对热气球、共济会、催眠术和戏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殖民地印刷厂、书商、私人图书馆和文学社团大量出现;道路和邮政服务改善,新风格给当时的人留下

①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pp. 8-9; Miranda Spieler,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pp. 57-69.

②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pp. 9-13; David Geggus, “The Caribbea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83-100; David Geggus,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Atlantic Perspective”, in Nicholas Canny and Philip Morg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50-18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35.

③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p. 6-7.

④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 2.

⑤ Laurent Dubois,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⑥ David Geggus, “The Caribbea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pp. 83-100; David P.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p. 29; Wim Klooster, *Revolutions in the Atlantic World: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77-178.

了深刻印象。^① 詹姆斯·E. 麦克莱伦三世以殖民地的科学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科学社团在殖民地的发展和科学社团“费拉德尔菲俱乐部”(Cercle des Philadelphes)的历史,这为研究海地革命提供了新视角。^② 不过,学界对这个俱乐部的性质还存在争议,布朗什·莫雷尔(Blanche Maurel)和皮埃尔·普吕雄(Pierre Pluchon)认为它是一个共济会组织,在科学研究的掩饰下隐藏他们的密谋和政治活动,而麦克莱伦三世则坚持俱乐部的科学属性。^③ 杰里米·D. 波普金在《海地革命简史》中介绍殖民地主要城市法兰西角(Cap Français)的白人生活特点和城市发展时,提到了共济会和科学社团。他说:“这座城市有书店、共济会会所,并且在1784年,它成为继费城和波士顿之后,西半球第三个拥有学术社团的社区。费拉德尔菲俱乐部于1789年被承认为皇家学院。”^④ 苏迪·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提到在圣多明各有20个共济会分支,很多会员参与了“费拉德尔菲俱乐部”的活动。另外,他认为杜桑身边的核心人员是共济会成员,这可能间接影响了杜桑。^⑤ 启蒙时代也是科学的时代,在杜桑身上可以看到他对自然和理性的崇拜。共济会构建的跨大西洋的人员和思想传播网络可能影响到革命的缘起,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 语

海地革命研究经历了西方学界普遍的“沉默”到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转变,成为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研究领域。就其研究路径而言,经历了从“种族叙事”到“阶级叙事”再到“大西洋转向”的转变。这种划分立足于各自解释维度的持久影响力,反映了海地革命研究的路径转向和研究趋向。每一种研究路径与时代政治和学术环境有关,更与历史学家的种族和国籍背景有关,这在海地第一代历史学家托马·马迪乌和博布伦·阿杜安的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历史为政治服务,为争取民族认同服务,因而关于海地革命的种族叙事具有明显的种族—精英色彩。

由詹姆斯开创,埃里克·威廉姆斯、艾梅·塞泽尔和罗宾·布莱克本发展的海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把黑人精英特别是奴隶纳入了革命叙事范畴,承认了黑人的革命贡献。同时,他们用阶级和经济利益来划分不同群体并解释其对革命的影响,认识到了革命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特别是艾梅·塞泽尔关于海地革命是一场独特革命的论断提高了海地革命和黑人文化的地位,具有反殖民主义和反“欧洲中心论”的倾向,这与海地革命研究的“大西洋转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这种转向下,史家主张把海地革命置于“大西洋视野”下,审视革命的起源、进程、结局和影响,拓展了早期

① John D. Garrigus, “White Jacobins/Black Jacobins: Bringing the Haiti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Together in the Classroo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3, No. 2, 2000, pp. 264–265.

② James E. McClellan III, *Colonialism and Science: Saint-Domingue and the Old Reg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③ James E. McClellan III, *Colonialism and Science: Saint-Domingue and the Old Regime*, pp. 183–205.

④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p. 22.

⑤ 苏迪·哈扎里辛格:《黑斯巴达克斯:海地国父杜桑·卢维杜尔传》,祁长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208页。

史家种族叙事和阶级叙事的不足,有利于认识到海地革命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2001年5月21日的《陶比拉法》(*La loi Taubira*)首次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认定为反人类罪,并设立了奴隶制记忆委员会。这与传统法国革命史学的衰落和共和神话的解构有关,学界关注殖民地对革命的影响,研究海地革命成为法国史家深入探究法国革命的棱镜,符合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光荣叙事。^①此外,在后殖民主义和大西洋史研究的影响下,在与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的互动下,海地革命史研究必将深入发展,丰富我们对海地“革命传统及其失落的宝藏”的记忆。^②同时,海地革命研究为史学界重新思考和评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等其他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马伟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关于陶比拉法(*La loi Taubira*)和相关纪念日的设立,参见“Les commémorations de 1848 à nos jours”, <https://gip-mmata.org/les-commemorations/>[2023-3-23];菲利普·吉拉尔把法国学界关于海地革命的研究很有限的原因归于它不符合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光荣叙事,但笔者认为,海地革命正是这种叙事的体现。吉拉尔的观点,参见Philippe R. Girard,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istory’s New Frontier: State of the Scholarship and Archival Sources”, p. 492。

② “革命传统及其失落的宝藏”源自汉娜·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论革命》第六章的标题,笔者借用这一提法表达海地革命研究的意义,参见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1960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like Terence Ranger. This school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by deepen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Afric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further expanding its methodology,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raining historical talents. By the 1970s, its guiding ideology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Marxism, and its members launched the intense criticism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This school entered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by the late 1980s, making further breakthroughs in historical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The range of topics it addressed significantly expanded, and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s improved. While this school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t has also been widely controversial, mainly due to its excessive focus on ideology, lack of original guiding ideas and its failure to fully guide historical practice with academic ideas.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is a microcosm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How to realize the revival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issue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Africa.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Haitian Revolution Studies // Ma Weiju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Atlantic world, and its history remains a hot topic among scholars today. The study about this historical event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hrough the “class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racial narrative” emphasizes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role of the mulattoes and black elites, ignoring the rol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slaves. It argues that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have succeeded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The “class narrative” highlights class conflict, believing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a class issue rather than a racial one. It transitions from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black Jacobins to that of the vast slaves. The “Atlantic turn” places importance on the “Atlantic factors” in the revolution’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mpact, believing that the Haitian Revolution, like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tlantic history and has even formed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study. This shift i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evolu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t has revitalize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both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 Cheng Weihua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focus on historical writing, believing that the historical text is a form of verbal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can be neither true nor false. This point of view has been fiercely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fter introducing these criticisms and post-modernist scholars’ self-defens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nd investigates theoretical shif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two representatives, Hayden White and Frank Ankersmit. By doing so, it reappraises postmodernist views. To be more specific, there are some shif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hite’s and Ankersmit’s views, which have made distinctions to some extent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fictional narratives. Yet, both of them have overlooke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rejected the possibility of “tru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s a result, they fell into the traps of historical relativism and their views may even have become self-contradictory. Compared to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idealism, scholars today need a narrative realism, which is more suitable to historical research.